

班马之后第一人——陈寿与《三国志》

◎ 梁满仓

【摘要】《三国志》记录了三国这个中国历史上非凡的时代，体现了史家实事求是的传统，用最小的篇幅塑造出给人印象极深的人物，不但表达了陈寿对蜀汉政权的感情，也展现了陈寿高超的写作技巧。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关系到陈寿作为史学家的“史德”问题。除去加在陈寿身上的不实之词，客观地分析他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可以发现他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并没有贬低诸葛亮。陈寿不仅有“史才”，也不失“史德”，不愧为班马之后第一人。

【关键词】《三国志》；陈寿；史德；诸葛亮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21)1-0109-10

《晋书》评价陈寿说：“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①在奋鸿笔于西京的司马迁、骋直词于东观的班固之后，陈寿可以算得上“继明先典者”。这是对陈寿史学才能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陈寿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单独将陈寿与司马迁比较也可以发现，二者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

一、忍辱负重写历史

先说司马迁的忍辱负重。西汉武帝时，曾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征伐。在一次征战中，将军李陵孤军深入，由于众寡不敌，被俘投降。汉武帝得知此消息，雷霆大怒，而司马迁又在此时

①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二《陈寿传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9页。

〔作者简介〕 梁满仓，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 100000。

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汉武帝投入监狱，最后处以宫刑。被处以宫刑对司马迁来说是个奇耻大辱，他在给任安的一封信中，把受辱之事由轻至重进行了排序：“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①在司马迁看来，宫刑是极端之辱。然而他却选择了“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是因为他正在写的《史记》还草创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可见司马迁所忍为宫刑之辱，所负之重为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

和司马迁一样，陈寿也是忍辱负重写历史，其所忍为亡国之辱。陈寿是三国蜀汉人，公元263年，蜀汉被曹魏灭亡，陈寿成为曹魏臣民，两年之后曹魏被西晋所代，陈寿又成为西晋臣民。公元280年，陈寿又亲眼看到孙吴被西晋所灭，全国统一。可以说，与陈寿同时代的人，大部分都有亡国的经历，都感受过亡国的耻辱。蜀汉、孙吴被灭亡之后一些人的表现都反映了亡国之人的耻辱感。

公元263年，曹魏调集大军发动了灭蜀之战。曹魏军在久攻剑阁无果后，大将邓艾率军从阴平小路绕过剑阁进入成都平原，一路势如破竹，兵临成都城下。后主刘禅投降。而此时蜀汉大将姜维正在剑阁抵御曹魏大军。当他们得知皇帝已经投降，命令他们停止抵抗时，“将士咸怒，拔刀砍石”^②。而后姜维假意投降，并在曹军中策反钟会，企图发动兵变复国。从姜维及其将士的反应中，可见他们耻于亡国的心态。

陈寿的老师谯周，虽然出于顺应天下统一大势，避免无辜百姓死亡而主张投降，但对国家灭亡绝非无动于衷。《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载：“时晋文王为魏相国，以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又下书辟周，周发至汉中，困疾不进……晋室践阼，累下诏所在发遣周。周遂舆疾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骑都尉，周乃自陈无功而封，求还爵土，皆不听许……六年秋，为散骑常侍，疾笃不拜，至冬卒。”^③后来，谯周病逝，临终嘱咐其子：“久抱疾，未曾朝见，若国恩赐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当还旧墓，道险行难，豫作轻棺，殓已毕，上还所赐。”^④托病不入朝，求还爵土，入葬不穿朝服，这些举动反映了谯周以亡国为耻的心态。

蜀汉人李密，亡国后西晋朝廷征其入朝，李密以祖母年高，无人奉养为由，给皇帝上了一封书表陈情：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恤，况臣孤苦疴羸之极。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宠命殊私，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私情区区不敢弃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

① 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2页。

② 陈寿：《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67页。

③ 陈寿：《三国志》卷四二《蜀书·谯周传》，第1032页。

④ 陈寿：《三国志》卷四二《谯周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第1032页。

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而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①

李密以“孝”作为辞官不仕的理由，使得标榜以孝治天下的朝廷不好一再催逼，所以一直到祖母去世，李密都没有入朝为官。奉养祖母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以亡国为耻的感情。

以亡国为耻，不仅是蜀汉人，孙吴人也如此。《晋书·周处传》载：

及吴平，王浑登建邺宫酺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处对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浑有惭色。^②

周处反唇相讥，不仅表达了吴人的亡国之戚，也嘲笑了王浑不知亡国之耻的表现。晋武帝曾经对华谭说：“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越雠，屡作妖寇。”^③晋武帝这番话也反映了孙吴人对亡国的感受。

陈寿则是另外一种表现。据《晋书·陈寿传》载，陈寿在蜀汉时，父亲去世，陈寿守丧期间，因生病，使婢丸药。这一场景恰巧被来客所见，于是传开，社会舆论都认为陈寿不孝。直到西晋时，陈寿被这种舆论所贬议，多年被排斥在仕途之外。陈寿本可借此为由，长此下去，不入仕途。然而陈寿并非如此，而是结好朝中权贵，为自己出仕创造条件。史载“司空张华爱其才，以寿虽不远嫌，原情不至贬废，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④。在社会舆论对陈寿不利的情况下，司空张华力举陈寿出仕，可见陈寿与当朝权贵的关系之密切。这给人一个印象，似乎陈寿乐于当官，颇有“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意味。

难道陈寿果真对蜀汉的灭亡无动于衷吗？果真对亡国没有耻辱感吗？果真对当官如此痴迷吗？事实并非如此。张华曾要推举陈寿为中书郎，另一个权贵荀勖因与张华不和而从中作梗，使得陈寿没有做成中书郎，而是到长广郡做太守。而陈寿以母老为由辞官未就。可见陈寿不是什么官都做。我们再看看陈寿所做过的官：仕蜀为观阁令史；在西晋朝为佐著作郎、著作郎，领本郡中正。观阁令史在《华阳国志》作东观秘书郎，其职掌当为管理国家图书、校订书籍等。著作郎的职掌是管理国家图书及国史和起居注的修撰，佐著作郎协助著作郎工作。由此可见，陈寿所任之官，大多与管理校订典籍有关，与修史撰史有关。我们知道，西晋统一全国后，陈寿就开始撰写《三国志》。元康七年（297），陈寿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頔等上表曰：“臣等案：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⑤于是皇帝下诏，让人到陈寿家抄写《三国志》。可见在此以前，陈寿所撰《三国志》不是官方典籍，陈寿撰写《三国志》属于私人修史。陈寿是蜀汉人，没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曹魏、孙吴两个政权的史料。特别是三国统一以后，各国的文书

①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八《李密传》，第2275页。

② 房玄龄等：《晋书》卷五八《周处传》，第1570页。

③ 房玄龄等：《晋书》卷五二《华谭传》，第1450页。

④⑤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二《陈寿传》，第2137页，第2138页。

典籍全都集中在洛阳西晋朝廷，陈寿只有出来当官，才能够接触到三国国家典籍文书，从而能够凭一己之力完成《三国志》的撰写。和司马迁一样，陈寿也是忍辱负重写历史，他忍受的是亡国之辱，担负的是完成一部流传千古的史学名著的重任。

二、史学名著传千古

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史记》；陈寿忍辱负重，也完成了一部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史学名著《三国志》。我们说《三国志》是一部具有高度历史和现实价值、名垂千古的史学著作，主要有以下理由：

第一，《三国志》记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凡的时代——三国时代。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它第一次证明了官僚行政基础上统一国家的生命力。在西周建立以前，天下邦国林立，武王灭商后，才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局面。但这个统一王朝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分封基础上的。宗法血缘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血缘浓度经不住时间的稀释。时间越久，血缘关系越远，宗法约束越松。春秋战国局面的形成，就是宗法血缘疏淡的结果。秦灭六国，实行郡县制度，统一王朝建立在官僚行政基础之上，宣告了血缘宗法基础上统一的结束。以后的西汉、东汉，统一的基础仍然是以郡县制度为特征的官僚行政体系。东汉末期，天下分崩，群雄割据，建立在官僚行政基础上的统一制度第一次面临考验。而魏、蜀、吴三国的出现，是天下分崩到局部统一的标志，是实现最后统一的必要过渡。而整个三国时期乃至最后统一，官僚行政的基础始终未变。可以说，三国以其自身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官僚行政基础上统一国家类型的生命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曹操、刘备、诸葛亮、孙权、鲁肃等一大批具有统一意识的杰出人物，以及在他们麾下努力奋斗的群体。正是这批可称为“英雄”的人物造就了三国“英雄辈出”的时代。另外发端于三国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度、三省制度、玄学思想、建安文学，显示着这个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创新特点。所有这一切，证明了三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和非凡性。而正是《三国志》，把这个重要时代以文字形式完整、系统地记录下来，为我们今天了解与研究三国时代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三国志》体现了史家实事求是的传统。中国有连绵不断的历史记录，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史家的优良传统，这就是“实录”，“不虚美，不隐恶”，用今天的话就是实事求是。如果说不虚美不隐恶是史学家的优良品德，那么这种品德体现在陈寿身上尤为难能可贵。因为陈寿所写的《三国志》，对陈寿来说是一部现代史。西晋王朝是从曹魏继承过来的，记录三国的历史，免不了要涉及到与当朝皇帝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晋武帝的祖父司马懿在曹魏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太傅。晋武帝的伯父司马师继司马懿之后任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晋武帝的父亲司马昭在司马师之后继续担任所有要职。司马懿在魏明帝死后发动了“高平陵政变”，对自己的政敌进行了大规模清洗杀戮；司马师废黜了曹魏小

皇帝曹芳；司马昭杀死了曹魏另一个小皇帝曹髦。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衡量，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恶行。东晋明帝司马绍曾经问王导，祖先们如何得的天下。王导便讲述了司马懿父子的事迹。司马绍听后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①陈寿写《三国志》，如何记录这段历史，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实录司马懿父子的行径，不但自己身家性命不保，《三国志》也无法完成和流传。如果不照实书写，又违背了史家“不隐恶”的传统。在艰难的选择面前，陈寿毅然选择了实录。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要求陈寿直言不讳的实录，而是应该理解并赞同陈寿用春秋笔法所进行的实录。下面我们具体看看陈寿既保护了自己又不失实录的春秋笔法。

关于高平陵政变，《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车驾谒高平陵。太傅司马宣王奏免大将军曹爽、爽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官，以侯就第。”^②在《曹爽传》中记载了司马懿的奏疏：

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③

关于司马师废黜少帝曹芳，《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秋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

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庙，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④

关于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曹髦，《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二十岁就死了，只有两种可能，不是病死就是死于非命。接着《三国志》便记载了皇太后令：

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前后数十。此儿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因酖毒，重相设计。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呼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言今日便当施行。吾之危殆，过于累卵。吾老寡，岂复多惜余命邪？但伤先帝遗意不遂，社稷颠覆为痛耳。赖宗庙之灵，沈、业即驰语大将军，得先严警，而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陈间，为前锋所害。^⑤

从上述记载看，似乎高平陵政变、废黜皇帝曹芳、杀死皇帝曹髦都与司马氏父子没有直接关系，所有这些的直接责任者都指向了皇太后。这个皇太后就是魏明帝的郭皇后，魏明帝死后，郭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然而我们再读《明元郭皇后传》，里面的文章就出来了：

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于太后而后施行。毋丘俭、钟会等作乱，

①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宣帝纪》，第20页。

②④⑤ 陈寿：《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第123页，第128页，第143-144页。

③ 陈寿：《三国志》卷九《曹爽传》，第286页。

咸假其命而以为辞焉。^①

“宰辅”即司马懿父子，与夺大事皆咨启太后施行，起兵作乱咸假太后命为辞，这两句话并列，里面的内容令人玩味，令人深思。而画龙点睛的精彩之笔是《后妃传》最后的陈寿评：

魏后妃之家，虽云富贵，未有若袁汉乘非其据，宰割朝政者也。^②

既然曹魏的后妃们没有像东汉那样外戚干政者，那么，搞政变、废皇帝、杀皇帝等行为，是该皇太后负责，还是该司马氏父子承担呢？答案显然是后者。一百多年以后，刘宋裴松之评价《三国志》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③“事多审正”，即是陈寿写史的求实态度。

第三，《三国志》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评价陈寿《三国志》善叙事，的确中肯。仅举两例说明。如记载三国历史的开端，按时间说应该是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曹魏建立时起。但如果这样记载，三国的历史就显得十分突兀，人们就不知道三国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这样，三国的历史就没有了源头。陈寿《三国志》用了三卷的篇幅为一组东汉末期的人物立传，由于这些人都和三国的形成有关，使得三国的历史成为有萌芽、有形成、有发展、有结束的完整过程。这是陈寿记述历史善于布局巧于安排之处。再比如，《三国志》一共65卷，而这65卷的篇幅不是在三国中平均分配的，其中《魏书》30卷，数量第一；《吴书》20卷，位居第二；《蜀书》15卷，篇幅最小。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不是因为蜀汉史料最少，而是当时社会政治形势所决定的。西晋王朝继承曹魏，所以曹魏政权是历史正统，对曹魏政权浓墨重彩，实际是为了突出西晋政权的合法性。孙吴是被西晋所灭，在孙吴政权身上花较多的笔墨，是为了突出西晋政权灭吴统一全国的功绩。因此，《蜀书》篇幅最小就是必然结果。然而，《蜀书》所占篇幅虽小，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极深。如果按照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选一个“忠”的典型，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诸葛亮。选一个“义”的典型，立刻就会出现关羽义薄云天的形象。选一个“仁”的典型，首当其冲是刘备。选一个“勇”的典型，马上就会想到“关、张之勇”。忠义仁勇的典型人物全在《蜀书》，用最小的篇幅塑造出给人印象极深的人物，这不但体现了陈寿对蜀汉政权的感情，也体现了陈寿高超的写作技巧。

第四，《三国志》是一幅珍贵的文化之锦。《三国志》也有令人遗憾之处，就是它的简略。南朝刘宋裴松之就认为《三国志》“失在于略”，为此以注的形式为《三国志》补充了大量的史料。据现代学者统计，裴松之注的文字与《三国志》本文比例基本是一比一。尽管《三国志》简略，仍不影响它的价值。《三国志》本文与裴注，是一种“锦上添花”的关系。蜀人善于织锦，蜀锦是当时最名贵的丝织品。陈寿是蜀汉人，他也善于织锦，他所织的是一幅“文化之锦”，只不过这幅锦有些“素”，裴注正好为这幅素锦“锦上添花”。如果说《三国志》为我们今天了

① 陈寿：《三国志》卷四《魏书·明元郭皇后传》，第168-169页。

② 陈寿：《三国志》卷四《魏书·后妃传论》，第169页。

③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第1471页。

解研究三国历史提供了完整、全面、系统的资料，有了裴注，就可以再加上“翔实”二字。

第五，没有《三国志》就不会有今天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在《三国志》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文学作品。假设没有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后来会不会产生《三国演义》呢？也许会。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在陈寿《三国志》以前，也曾有过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如曹魏王沈所撰《魏书》，鱼豢所撰《典略》《魏略》，孙吴韦曜等撰写的《吴书》等。这些书均属于国别史，即分别记述本国的历史，不像《三国志》那样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不但如此，在“实录”方面也有欠缺。例如王沈所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①。再比如鱼豢的《魏略》，在记录本国历史时可以做到实录，在涉及敌对政权时就不免有戏说之嫌。例如记载后主刘禅，《魏略》说：

初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遽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为洗沐送诣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②

这种记载显然与事实不符。裴松之对这个记载加以辩驳：

《二主妃子传》曰“后主生于荆州”，《后主传》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则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败于长阪，备弃妻子走，《赵云传》曰“云身抱弱子以免”，即后主也。如此，备与禅未尝相失也。又诸葛亮以禅立之明年领益州牧，其年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与禅传相应，理当非虚。而鱼豢云备败于小沛，禅时年始生，及奔荆州，能识其父字玄德，计当五六岁。备败于小沛时，建安五年也，至禅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禅应过三十矣。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余言，异也！又案诸书记及《诸葛亮集》，亮亦不为太子太傅。^③

再如刘备到荆州投奔刘表后，听说诸葛亮是具有才能的贤人，便三顾茅庐，请他出来辅佐自己。这个史实到了鱼豢《魏略》便改变了味道：

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性好结髦，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髦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邪？”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

① 房玄龄等：《晋书》卷三九《王沈传》，第1143页。

②③ 陈寿：《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裴注，第893-894页。

“无非计乎！”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①

试想如果没有《三国志》，以那些不系统、不全面、有欠实录的记载为根据而创作的《三国演义》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吗？这就是我们在《三国演义》前加上“今天的”三个字定语的原因所在。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我们可以说，《三国志》是一部具有高度历史和现代价值的、流传千古的史学名著。

三、除却污名说史德

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问题是历史上一段众说纷纭的公案。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有两句话：一句是“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一句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对这个评价，不认为诸葛亮是著名军事家的人以之为立论的根据，而崇拜诸葛亮者则认为此论有失公允。唐人所修《晋书·陈寿传》就属于后者：

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②

对上述记载，李小树先生曾做过有力的辩驳，他指出，马谡在街亭之役时的职务为参军，而根据当时官吏制度，参军之下不可能再设参军，所以“寿父为马谡参军”的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再有，陈寿的父亲因马谡一事受髡刑处罚，那么时间应当在建兴六年中，而髡刑输作的刑期是五年，五年之后陈寿的父亲刑满回家，距离陈寿出生不足六个月，这不符合常理。因此，“寿父亦坐被髡”也不属实。根据《三国志》的记载，丁仪、丁廙兄弟因帮助曹植与曹丕争位，曹丕即位后将丁仪、丁廙兄弟和他们家族的男性亲属全部处死，自然不可能有儿子在数十年后被陈寿“索米”，因此，“索米立传”之事也是虚构的。这两件事均采自治史态度不甚严谨的王隐所著《晋书》^③。唐人所修《晋书》为什么要将两个不实的记载写入呢？其目的是为了说明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不实。《晋书》为诸葛亮军事才能正名的目的确实达到了，但同时也把陈寿污名化了。

除却了陈寿身上的污名之后，再来分析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一语出自《诸葛亮传》：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讎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

① 陈寿：《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第913页。

②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二《陈寿传》，第2137-2138页。

③ 李小树：《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中州学刊》1997年第1期。

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①

通观陈寿之评，在“连年动众”句之前，对诸葛亮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最后一句中华书局本标点为感叹号，笔者认为当为疑问号。“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不是陈寿的话，而是袁准所说：“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②陈寿的意思是，诸葛亮多次北伐功效不显，这大概就是人们说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根据吧？这是揣测袁准之所以如此评价诸葛亮的原因，根本没有否定诸葛亮军事才能的意思。“治戎为长，奇谋为短”一语出于陈寿上《诸葛亮集》表：

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③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然亮才”以前，充分肯定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第二层意思，“然亮才”以后至“而所与对敌”以前，是说诸葛亮自己与自己比。诸葛亮有治国、理民、统军、奇谋多种才能，所谓“奇谋为短”是相对“治戎为长”说的。第三层意思，是诸葛亮的才能与对手比，并不比对手逊色，只是受客观条件限制，才导致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是说诸葛亮既有智又有力，只不过天命不在他一边而已。这里也没有贬低诸葛亮军事才能的意思。

辨析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关系到陈寿作为史学家的“史德”问题。如果按照《晋书·陈寿传》所说，陈寿出于私人恩怨而贬低诸葛亮，为“索米”而随意写史，就丧失了史家之德。除去加在陈寿身上的不实之词，客观地分析他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可以发现他的评价并没有贬低诸葛亮，而是客观、公允的。陈寿不仅有“史才”，也不失“史德”，不愧为班马之后第一人。

（责任编辑 向 野）

①③ 陈寿：《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34页，第930-931页。

② 陈寿：《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裴注引《袁子》，第935页。

On the Gathering and Rising of Sichuan Writers in Left-wing Literature

Chen Li

Abstract: In Chinese left-wing literature in 1930s, Sichuan writers got rid of local fierce struggle and went to Shanghai, Beijing, and other central cities. Under the banner of Left League, they helped and supported each other, and formed a regional creation group in Chinese left-wing literature. Under the guidance and support of cultural predecessors such as Lu Xun, Mao Dun and Yu Dafu, they focused on writing their familiar things in their hometown- Sichuan, and forming a unique writing style of Sichuan left-wing writers.

Keywords: Left-wing literature; Sichuan writer group; gathering; rise; Lu Xun; Mao Dun; Yu Dafu

Chen Shou, "the First Great Man" in the Post Age of Ban Gu and Sima Qian, and His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Liang Mancang

Abstract: Sima Qian and Chen Shou both recorded history, while enduring humiliation. Sima Qian wrote a great historic book "to thoroughly research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plore the change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express independent thoughts in writing to form a school of his own", after experiencing castration (a punishment in ancient China). Chen Shou also wrote an ever-lasting famous historic book after his state was conquered.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is a historical masterpiece that has high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values and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It records this extraordinary period of Three Kingdom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reflects the tradition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mong historians. It creates impressive figures in the minimum space, which shows Chen Shou's care about Shu-Han regime as well as his superior writing skills.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provides complet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information for us to know and research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With the notes of Pei Songzhi, it is really "detailed".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s written on the basis of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In analyzing Chen Shou's evaluation on Zhuge Liang's military expertis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Chen Shou's "virtue of historical study" as a historian. Chen Shou should have lost the virtues as a historian if he belittled Zhuge Liang for the purpose of personal revenge and rewrote history at will to "obtain grain", as discussed in the *Book of Jin: Biography of Chen Shou*. However, it can be found after objective analysis for his evaluation on Zhuge Liang's military expertise, regardless of misstatements concerning Chen Shou, that he didn't belittle Zhuge Liang and instead objectively and fairly evaluated Zhuge Liang. Chen Shou has both the "talent as a historian" and the "virtue of historical study", and deserves to be deemed as the "First Great Man" in the post age of Ban Gu and Sima Qian.

Keywords: The *Recor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en Shou; virtue of historical study